

复旦国际政治经济学丛书

超国家治理

——
国际关系转型研究

陈玉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复旦国际政治经济学丛书

超国家治理

国际关系转型研究

陈玉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国家治理:国际关系转型研究/陈玉刚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复旦国际政治经济学丛书)

ISBN 978 - 7 - 208 - 08967 - 9

I. 超... II. 陈... III. 国际关系—研究 IV. D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9932 号

责任编辑 周 峥

封面装帧 陈 楠

· 复旦国际政治经济学丛书 ·

超国家治理

——国际关系转型研究

陈玉刚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227,000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967 - 9/D · 1647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序论	1
第一章 国际关系历史观	6
一、国际关系循环论	7
二、国际关系本质论	12
三、国际关系进化论	16
四、分阶段的进化史观	20
第二章 国际关系范式转换	35
一、范式转换与历史发展	36
二、国际关系历史上的范式与范式转换	40
三、新的国际关系研究议程	60
第三章 国际关系高级化	69
一、国际关系基本状态	70
二、国际关系复杂化	77
三、全球性秩序的构建	92
第四章 主权与超主权	113
一、国际关系基本分析法	113
二、主权的分析困境	119
三、进程和超主权	128

第五章 一体化安全	140
一、安全的范式与理念	140
二、一体化安全的内涵	153
三、一体化安全的挑战	159
第六章 超国家治理体系	167
一、国家的自主性与超国家治理的空间	168
二、欧洲的超国家治理体系	176
三、超国家治理的体系与实践	186
结尾	199
参考文献	203

序 论

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是作者自从事国际关系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以来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许也是国际关系学界普遍都在探索的一个问题。自从我们开始引进、介绍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来，我们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一直就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理论研究为指挥棒，几大主义几大理论成了最主要甚至是大部分的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的主料和佐料，以至于没有这些“主义”或“理论”的出现，似乎就显得作者不懂国际关系理论。有些学者对此实在忍无可忍，开始呼吁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些问题。那么，我们的问题又在哪里呢？这就是本书主要想探讨和回答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本书问题的一个主要来源。

我们自身的发展也急需我们研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就、为世人所瞩目并开始影响国际关系、重塑国际力量格局之后，我们就开始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或者压力，即其他国家如何看待我们的发展强大，我们如何使自己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协调起来，共同发展，我们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保罗·肯尼迪^[1]和罗伯特·吉尔平^[2]等人已经系统逻辑地论述了国际力量格局变动与国际战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理论成了许多人的信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作证明，证明国际关系的发展并不像他们的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又如何能真正地消除“中国威胁论”？如何能使大家相信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这是引起本书问题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本书问题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和考虑。而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解答了一个等于是解答了另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的发展变化日益加速和剧烈，并对我们国际关系的传统理解形成了巨大挑战。如何理解这里面的

发展变化和挑战?这就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理解并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把握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方向,就无法作出顺应发展潮流的调整和部署,就会处处落在历史的步伐后面,不断面临被淘汰的压力。

发展变化总是相对于原有的秩序结构而言的。国际关系现行的秩序结构的核心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际关系研究一个难以突破的情结就是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在这个体系中,世界划分为主权国家,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关系被看成是自古以来的状态,今后也会永远如此。^[3]一战后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都未能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影响”,“威斯特伐利亚‘情结’遮蔽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视野,造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停滞。”^[4]威斯特伐利亚发挥了一件束身衣的作用,它严重阻碍了国际关系学对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形式的前瞻能力。^[5]在这样一种束身衣的束缚下,有学者甚至断定,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没什么好研究的了,当亚历山大·温特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升到哲学高度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就走到了尽头。一进入哲学的王国,一切形而下的研究就显得没有必要了。这种论调更极端地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窘迫现状。因此,布赞和利特尔指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证明:“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仅不能理解各种前现代国际体系,且由于缺乏历史视角而难以回答,甚至在许多情况下难以解决现代国际体系中最重要问题。”^[6]

当我们试图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来讨论国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国际关系转型的研究领域。国际关系转型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冷战的结束被许多人认为是当前国际关系转型的起点。对此,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冷战结束都过了十多年,快二十年了,我们怎么还在谈转型?这种疑问实际上出自于对国际关系历史认识的不全面。其实,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国际关系的转型期比一个体系的存立期时间还要长。一种新型范式的诞生到完全确立和成熟需要经过漫长的发展时期,现代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诞生于1648年,但作为该体系的基本存立支柱,主权原则和民族独立原则真正的全球普及只是在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殖民化完成之后才出现,而这个体系完全存立没过多久,半个世纪不到我们又开始谈转型了。这样,这个体系冲破传统体系的束缚,也即传统体系进入转型花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而其真正成熟、存立的时间却不到半个世纪,转型期无疑远比成熟期时间要长。这在哲学原理上也是解释得通的,一个事物一旦成熟,也就开始面临它的衰亡和被超

越。自然界也普遍这样,庄稼的生长期要远远长于其成熟期。当一个体系最终成熟时,它其实已经在孕育新的东西了。

赫德利·布尔也曾经指出,今天的国家体系并非世界政治体系中所有的形式,今后也未必就一直是这种形式。“虽然今天的世界政治体系是以国家体系或主要以国家体系的形式(我们在下面还将谈到,一个世界政治体系正在出现,而国家体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存在着的,但是从理论上说,世界秩序还可以通过其他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得以实现……其他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但是它们不具有世界性。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国家体系并非是必然的产物。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后可能会出现不同于国家体系的新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7]

也许有人会认为本书的讨论显得过于理想主义了。事实上,作者从来就不敢低估社会保守力量的重要性和他们的作用。他们极力维护既得利益,社会秩序的任何改变都会被他们看作是对自己利益的损害,或者说,在他们没有看清变化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利益之前,他们拒绝任何变化。实际的情况是,作者一直努力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把握一个动态的平衡,寻找这个平衡点。如果过于执守于现实主义,那么观点和结论可能就会显得过于保守,就会置那些新生事物于不顾,就会无法预见未来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我们只有对新的和不同的东西保持警觉,才会不至于轻易地放过本质性的东西,即新时代的充满活力的动向。”^[8]而如果更多地沉迷于理想主义,就很可能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在其他竞争对手还没有变得无危害性之前,就先放下手中武器,那是对自己,也是对对手,对大家的不负责任。虽然联合国大厦前摆放着铸剑为犁的雕塑,但谁也不敢先走出第一步,先拧曲自己手中的枪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对峙的困境。

尽管如此,但情况也不至于像现实主义告诉我们的那样悲观,走出这种困境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出路就在于国际过程,从一种动态的渐进的过程变化中累积互相的善意,最终达到大家所希望的结果。这种过程的力量在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中我们已经能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所以,如果有读者要说作者是理想主义的话,那是一种谨慎的、渐进的理想主义,而不是那种指望一两年,数十年,甚至几百年就能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激进理想主义。或者也可以说,作者所持的观点更多地接近于自由主义。但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这两者并不在同一个平面上,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

一种直接关于本质的探讨。

另外,关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加上近些年来兴起的构建主义,作者想要指出的是,它们在为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模版(stereotype),禁锢了人们思想的创新。很多国际关系的学生认为,在解释一个现实问题时,总要事先选择一种理论,而当这种理论确定后,就要运用这种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这在国内这些年来对所谓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强调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机械做法的后果导致学生们不是在不同理论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就是不顾现实问题的完整性和事实性,削足适履,分割肢解现实问题,为我所用地随意解释现实问题。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多种理论和主义之间穿梭,执着于任何一种都会无法接近、理解事实的全部。

最后,回到本书要讨论的主题,即国际关系的转型问题。事实上,很多学者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即如何有限地改变国际社会的性质,如奥兰·扬从国际体制的角度,巴里·布赞等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本书则想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出发,从超国家治理的视角,总结这一国际关系的新生事物在区域性的国际关系上发生了什么本质性的变化,然后再从逻辑上证明这一区域性的国际关系转变将来可能发展为全球性的。尽管路径、角度不一样,但大家所想要讨论的问题的本质,或者说所希望指向的目标是一样的。

本书是一个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其中有些内容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在期刊和论文集中,这里就不一一指出。和发表过的文章相比,鉴于书的容量大,我们这里的讨论就显得更为系统,更成体系了,在不少方面也大大发展了发表过的论文提出的一些观点。

希望本书对国际关系的转型、国际社会的改造方面的思考能有所启发。

注 释

[1] 参见【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年版。

[2] 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3]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

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 页。

[4] 刘德斌:“译者序”,【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 页。

[5] “中文版序言”,【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第 1 页。

[6]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第 2—3 页。

[7] 【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17 页。

[8]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张广勇、张宇宏译:《当代史导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 页。

第一章 国际关系历史观

在进入国际关系转型的讨论之前,我们先得来谈谈国际关系历史观的问题。不放在一个历史演化的进程背景中,我们就无法理解当前变化的本质性意义。但是,在怎么看待历史进程上,不同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这里称之为国际关系历史观的不同。这种不同比方法论或理论的不同更具本质性,它所造成的差异是无法跨越的,或者说无法真正地讨论和对话的。

其实,说得再大一点,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诠释性的学科,即使像历史、经济等要求尽量客观、尊重事实的学科,在材料的取舍、结构的编排、数字的分析上,也总难免有很大的诠释性,带有研究者本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烙印。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也是如此。虽然说国际关系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但它的主要根基还在历史学,国际关系的许多结论,都来源于对历史的观察、分析和归纳,而这其中的工作,就是一项具有很强诠释性的工作。

诠释往往受主体个人某种预先具有的观念的影响。“任何试图解释世界历史进程和意义的努力包含着某种判断标准,或对待过去的哲学观点。”^[1]我们常把一个人在分析某个问题之前就预先具有的这种观念称为世界观,它是人几乎所有行为、言论的终极根源。世界观是一个人的身份特征,它包含了构成一个人非生理属性的几乎所有基因信息,一个人对所有问题的基本判断都能在这里找到根源。世界观不是理性形成的,而是主体在成长过程中各种因素的过滤沉积和综合的结果。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教育对世界观形成所具有的作用,这里所说的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因素,既可以是各种亲身经验,也可以是读书和教育。尽管它的形成不完全是理性所能解释的,但世界观对一个人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可以表现为一种非常理性的形式,但它对一个人的影响又几乎是完全非理性的。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可以表现为非常理性的,但如果细致观察,那么世界观影响的痕迹又处处可以得到体现。这种影响和一个学者分析问题是

否客观无关,或者说这根本就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东西。

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譬如,同样是讨论中美关系这个议题,有的学者专家对其前景非常悲观,认定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必然会对美国的世界霸权构成挑战,两国之间冲突在所难免,甚至可能爆发战争。^[2]而另有学者认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确实会对既有大国形成挑战和威胁,但只要其目标是有限而非革命性的,在既存国际体系和秩序下是可以调整和满足的,那么既有大国就可以成功地对它实施接触战略,和平地把它纳入既有国际体系,并使之转化成一个现有秩序的维护者。^[3]美中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非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4]对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当然,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和相互争辩是很正常、也很必要的事情,但我们这里的探究不应仅仅到此为止,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这种观点的不同不仅仅反映了问题是复杂多面的这一事实本身,而且也反映了问题的思考主体在对世界所抱的基本认知和判断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观点的不同根本上是由两方面造成的:一是相对于思考主体有限的认知能力而言,思考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二是思考主体本身的原因,他们具有先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的看待世界和问题的观念。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就是后一种情况,在一定意义上讲,后一种情况比前一种更具根本性。其根本性不在于中美关系这一问题本身,而在于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观点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这种不同事实上使得他们谁都无法说服谁,我们只能指出造成他们观点差异的原因,却无法改变他们长期以来就已形成的一系列基本观念。

世界观属于最宏大的一个观念背景,它包括信仰、生活态度、行为准则等各个方面。对于国际关系来说,世界观是重要的,但历史观的影响更为直接,因为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国际关系历史的观察和总结,因此,国际关系学者的历史观可以说就是他在进行国际问题研究时所抱的世界观。就其最基本的层面而言,我们发现国际关系的历史观可以分出这样三种:循环主义、本质主义和进化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争论中的许多分歧,从根本上讲,很多都可以追溯到理论创立者所持的这三种历史观的不同上。

一、国际关系循环论

国际关系循环论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历史观,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它常

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就认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这一点而言,不同的循环论者是相同的。

基本而言,这种历史观持这样一些观点:(1)历史存在着或长或短的周期,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又一个周期重复发生的过程。这就像经济学中的经济周期理论一样,认为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必然存在、难以根除的现象,萧条、复苏、繁荣、衰退这四个阶段依序循环发生的现象是宏观经济的必然规律,经济学的研究可以缓解经济这种周期性的变动所造成的痛苦和损失,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周期;(2)历史的循环可能会以更高级的方式进行,但循环当中存在的一些基本规律是不变的;(3)整个世界历史是这样一种循环,某个区域或局部的历史也逃脱不了循环的规律,只要这个区域或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区分是有效的,那么这种循环的轨迹必然也是可循的;(4)大部分重要的国际问题都可放在这样一个循环背景来理解,也只有在这个循环背景中才能把握其本质。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任务是确定循环处在哪一个阶段,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循环论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多种多样,在循环所依据的内容、循环周期的长短、循环阶段的划分和概括等方面互有不同。有的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循环论,但其对问题的诊断所依据的规律来源于某种循环论,遵循了某种循环史观。

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是最大的历史循环论。“汤因比像施本格勒一样,对于把历史进程看作一个单独的进步过程的‘线性’历史观表示怀疑,用‘周期论’的历史观取而代之。他的这种周期论认为,一系列的文明经历了多多少少大致相同的成长和衰亡阶段。”^[5]汤因比首先指出,历史的研究单位可以而且应该是文明;其次,一个文明的起源和产生应该符合两个条件:一方面是这个社会必须要有少数一部分具有创造力、能够领导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另一方面是这个文明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又有利又不能太有利,条件太优厚无助于一个文明的进取,条件太恶劣又会给一个文明的成长造成不堪负荷的压力;第三,一个文明起源后,就像一个有机体,会经历生长、衰退和解体、甚至灭亡的过程;第四,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的文明经受不住这种过程的打击,最后走向灭亡了,在人类的文明史中销声匿迹,或者仅仅存在于文明史的博物馆、死的书卷或其他有待考古学家去给它恢复生命的物体上,而有的文明则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过程循环。当然,这个循环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而是同一个文明在经历考验后的又一次新生;第五,决定人类文明史的生存法则是挑战与应战的法则,一个文明在其

起源、生长和衰退的过程中,都会面临各种各样自然的和来自自身文明内部以及其他文明的挑战,如果文明的少数精英能够带领文明的所有成员成功地应对并解决这种挑战,那么一个文明就会进入新一轮的发展周期,而如果应对失败,那么这个文明就可能解体甚至灭亡。^[6]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作为分析工具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无疑太大了点,它无法帮助解释特定时期特定的国际关系问题,但是在历史观念层面上,它至少在这样几个方面影响了国际关系分析:一、以文明而非国家为世界政治的分析单位,尽管他并不是这么做的第一人;二、适者生存的文明竞争法则,随着文明的兴起、强盛和衰亡,其统治疆域也会有相应的改变。这种论调为强大文明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三、世界政治的动荡来自于一个文明走向强盛或反之走向衰亡的过程。

这种大的循环史观影响了很多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当然也包括国际关系研究。根据不同的循环规律,乔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T. Gilpin)、保罗·维奥蒂(Paul R. Viotti)等人都非常有代表性地提出过不同的循环论。

乔治·莫德爾斯基在1978年撰文讨论了霸权周期的问题。^[7]他指出,国际关系的历史就是一个又一个霸权的产生和兴衰的历史,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往往产生一个新的霸权,历史上1494—1516年的战争诞生了葡萄牙霸权,1580—1609年的战争诞生了荷兰霸权,1688—1713年的战争诞生了英国霸权,而1914—1945年的战争诞生了美国霸权。新的霸权国总会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获取并合法化它的优势地位,而之后的国际安全和秩序就由霸权国来提供。当霸权国的优势和合法地位开始动摇并逐渐丧失时,新的全球战争就开始酝酿,而一场新的全球战争往往又会催生一个新的霸权。一个霸权的兴起与衰落,也即一个霸权周期,据莫德爾斯基研究判断,一般为一百年,英国从1713年到1914年实际上是维持了两个霸权周期,中间经历了一次1792—1815年的全球战争。

罗伯特·吉尔平和保罗·肯尼迪等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莫德爾斯基的霸权周期论,他们用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法则来分析一个霸权兴起和衰落的原因,指出只要一个新兴国家认为扩张给它带来的收益将会超过其为此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它就会开始扩展对领土和资源的控制权,扩大对国际经济的控制权。而一个扩张的强权在扩张过程,以及霸权的维护中,其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这些成本来自于维持海外驻军的费用,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的费用,提供

国际安全和国际经济秩序等公共产品的费用,惩罚体系的背叛者的费用等。一个霸权的长久与否就看它怎么很好地处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一旦成本超过了收益,一个强权的霸权也就难以维系,霸权因此而走向衰落。^[8]

保罗·维奥蒂和马克·考皮(Mark V. Kaupi)再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霸权循环史观,丰富了循环阶段的内容,并把它延伸到了古代的历史中。他们在一本教科书中指出,国际关系总会遵循独立国家体系、霸权体系和帝国体系这样三个阶段的循环。国际关系发生的第一个阶段是独立国家体系,体系中各国拥有主权,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内外政策,体系中任何一国都不具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明显优势,是一种多单位组成的相互独立的体系,古希腊的城邦体系就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最好的映照。国际关系演变的第二个阶段是霸权国家体系。在独立国家体系中,如果有少数几个国家慢慢确立了自己的明显优势,并形成了对其他弱小国家的影响和支配,特别是左右了它们的对外政策,那么霸权国家的体系就形成了。这里的霸权可以是一两个,也可以有多个,存在多个霸权的国家体系就称为集体霸权体系。希腊城邦体系中雅典霸权的确立,以及斯巴达的挑战就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典型的例证。在霸权国家体系中,如果一个霸权战胜其他霸权挑战者和竞争者,强大到能够支配其他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其他国家对这个唯一霸权国的至高地位予以正式承认或默认的话,那么这时国际体系就演变到了第三个阶段,进入帝国体系或宗主国体系。古希腊城邦霸权竞争的结果是导致马其顿的入侵,并迎来亚历山大帝国的时代。而当帝国中心或宗主国因为种种原因衰落了,帝国的其他部分或宗主国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就会纷纷要求独立,体系的权力集中被打破,国际关系重新进入一个独立国家体系的时期,历史开始新一轮的循环。^[9]这种循环规律在古代区域性的世界政治中表现得最明显,主权原则的确立和民族国家的诞生一定意义上阻断了国际关系的帝国演进阶段,但如果把最强大霸权的确立看作现代新版的帝国,那么这一规律还是换了种形式继续生存了下来,如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建立和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以及许多保守主义者把冷战的结束看作是苏联向美国竞争霸权的失败,美国治下世纪的真正来临。

亚当·华生(Adam Watson)又把这种循环简化成两个阶段,即从列国林立的无政府状态到普世性帝国的建立,而帝国衰落后体系又回到无政府状态,国际关系的历史如此循环反复。不同地区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有的地方帝国的时间长些,相比之下帝国属于常态形式,而有的地方反之,无政府状态的时间长些,帝

国则比较短命,无政府状态是主要的区域政治形式。〔10〕

沃勒斯坦对国际体系的周期性运动规律进行了总结,指出:“体系具有周期的节律(源于其持续发挥作用的结构会经历正常的波动)和长期的趋势(向量都有自己的演进方向,源于结构的不断演化)。因为,现代世界体系(像其他任何历史体系一样)既具有周期性,又具有趋势性——周期使体系恢复平衡,而趋势使体系偏离平衡——因而必然会存在着一个点,在该点上趋势能够形成一种情势,使周期的节律不再能恢复长期(相对)平衡。”世界的运动一方面可以从体系的发展变化来看,另一方面一个体系内又会因国家实力发展的不平衡而呈现出霸权兴衰更替的周期性规律。周期性保持了体系的相对稳定和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而趋势性则促使了霸权的转移和体系本身的运动。〔11〕

从文明到霸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持循环历史观的学者人数不少,他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一般总会首先去寻找他们认为正确的循环规律,而他们对现实问题的研判总是会首先去寻找历史上相似的一个阶段,然后依据循环的规律去分析这一问题的实质,以及这一问题符合循环规律的发展方向。基辛格就曾断言:“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这个国家及其重要人物可以谱写一个时代的国际关系特征,例如,十七世纪黎塞留时期的法国,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十九世纪梅特涅时期的奥地利,当然也包括二十世纪的美国。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谁来充当这一设计者,塑造新的国际关系秩序。〔12〕

历史循环论者相对会有些悲观,认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逃脱不了他所认定的循环怪圈,但并非所有的国际关系循环论者都是历史宿命论者,他也可能会相信历史的循环可以以后一个循环比前一个循环更高级的方式展开。但他们又倾向于认为这种变化大多是形式上的,循环中一些实质性的规律并不会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关系循环论者和我们下面要讲的国际关系本质论者有时候很难有效区分,两者都认为当前的国际关系必然能在历史上某个阶段找到相似性,因而在政策和行动考虑上也可从历史上找到借鉴之处。

和其他国际关系历史观相比,循环论的优点在于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因为只有放到很远的历史中来考察,循环的轨迹才依稀可循,这很大程度上能满足那些对历史有偏爱的人。宏大久远的历史视野给人以整体性的感觉,但是,表面的整体性背后,却存在着很大的简约化处理的问题。因为循环论者为了确立其循

环的阶段划分,必然会去确定一个逻辑主线,如国际关系权力的分配格局,生产力的发展与变革,社会决定因素的变更(如神灵、权力、土地、资本等)等,这种简要处理的结果是对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以及对每一阶段实际情况的认识的不足。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决策者来说,在他以为掌握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整体的背后,是对国际关系现实的错综复杂性,以及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缺乏足够的体认,这在有些时候会造成致命的错误。当一种循环观点一旦确立后,它就排挤了其他可能性的空间,超越在这里是没有地位的。

二、国际关系本质论

和循环论相比,本质论对历史的处理更简约。本质论者相信,国际关系存在一些亘古不变的基本法则,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时代和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基本的法则始终在支配和左右着国际关系。

罗伯特·吉尔平对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作出过一个高度总结性的判断,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历经数千年一直也没有发生变化。国际关系仍然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独立行为者之间争取财富和权力的循环斗争。”^[13]

汉斯·摩根索归纳了政治现实中的六项基本法则,指出政治现实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而这种规律根植于人性之中,自古迄今,人性未曾改变;现实的政治就是追求强权,把强权作为利益,国际政治中追求强权就是一个国家的理性;把利益和强权作比较,那么利益才是人性中最亘古不变的因素,强权是利益和民族国家结合的历史产物,“因而必将在历史进程中消失。现实主义立场丝毫不影响下述看法:当前政治世界划分为民族国家的状况,将会由性质截然不同的,与当代世界的技术潜力和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更大单位所取代。”^[14]民族国家的体制,因而也是当代国际政治的性质,并不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政治即使不是不讲普遍的道德原则,它也有特殊的道德要求,谨慎是政治道德中的最高原则;不能把某个国家的利益和普遍的道德律令等同起来,在保护和促进本国利益同时,也应该尊重别国利益;最后,政治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有其独立的逻辑,这个逻辑还是那句话,即强权就是利益,因此不能用其他领域的逻辑来要求政治领域的事务。^[15]

也有许多其他学者相信,国际政治的本质几乎是千古不变的,譬如马丁·怀